

研究論文

台灣亡國感？台灣民眾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媒體信任、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與行為意圖分析

黃琰戩、傅文成

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台灣民眾，在香港反送中議題的媒體注意程度、媒體信任程度，對中國大陸所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與支持民主行為意圖影響。本研究運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滾雪球方式抽樣，總計獲得520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網路媒體注意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電視媒體注意程度則與兩者無顯著關聯。民眾越信賴媒體，會有更高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最後，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詞：香港反送中、媒體信任、風險感知、行為意圖、負面情感

黃琰戩，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國防部政戰局參謀。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政策行銷、大數據應用。電郵：f1040730320@gmail.com

傅文成，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傳播博士、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興趣：傳播與情緒、政策行銷、大數據應用。電郵：uiucfuwencheng@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0年9月10日。論文接受日期：2021年6月11日。

Research Article

Taiwan's Illusion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People's Media Trust, Risk Perception, Negative Affec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s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Wen-Jian HUANG, Wen-Cheng F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how media attention and trust has influenced the risk perception, negatively affec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 threat of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5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utilizing a network questionnaire and snowball sam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ine media attention is a positive predictor of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ttention of TV media,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more trust individuals placed on media, the higher their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Finally, a negative affect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Wen-Jian HUANG (Staff Officer of the Political Warfare Bureau). Master of Arts in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iwan.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cy marketing, big data analysis 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en-Cheng FU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Head).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aiwan.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 policy marketing, big data analysis 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s Illusion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Keyword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media trust, risk percep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negative affect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W.-J., & Fu, W.-C. (2022). Taiwan's illusion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people's media trust, risk perception, negative affec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s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1, 161–19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前言

2019年香港民眾對其政府修頒《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內容不滿，爆發反對修頒逃犯條例運動(以下簡稱反送中運動)。原因為部分民眾擔心，香港政府與北京當局會憑藉此法案，將罪犯移交至中國大陸審理。運用修法手段，使中國大陸政府更易於干預香港政治制度，使香港的民主政體名存實亡。雖港府保證不會移交政治犯至中國大陸，但此舉已造成民眾強烈反彈，並質疑北京政府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因此，據BBC中文網2019年9月16日報導，香港民陣團體自2019年6月9日起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後續隨政府立場與陳抗民眾訴求相左，遲遲未有共識，政府未正面回應人民訴求，且警察濫捕、濫權，甚至是暴力鎮壓手段，民眾的抗爭活動已從原本和平示威遊行，激化為警民暴力衝突(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

另一方面，台灣華視新聞網2019年11月5日報導，中國大陸政府以「示威已構成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出現恐怖主義苗頭」定調此抗爭行動，提出「如有分裂中國意圖，必當粉身碎骨」言論，企圖威嚇香港示威民眾；其次，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肯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陳抗民眾的暴力鎮壓手段，並強調香港政府需「以暴治亂」恢復秩序，重申貫徹對香港「一國兩制」方針(黃育仁，2019年11月5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指出，台灣與香港處境相仿，同樣面臨中國大陸政權企圖介入民主政體的威脅，其中習近平在2019年1月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提出「台獨是歷史的逆流，統一是歷史大勢」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強調北京政府從未放棄武力犯台，此類企圖侵入中華民國政權之論述(Chien，2019年9月16日)。

再者，吳介民、廖美(2015)與台灣國防報告書(2019)中提及，中國大陸除了運用軍事演習、軍機艦繞台等武力威脅手段外，同時也運用經濟禮遇、政治干預、注資台灣新聞媒體、操弄文化等方式，逐漸滲透至台灣社會內部，企圖分化民心；其次，中國從外交方面不斷打壓台灣參與各項國際事務、壓縮台灣在國際發言空間；運用多種渠道施壓，迫使台灣當局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台灣亡國感？

另一方面，香港民眾因不滿政府違反「50年不變」¹承諾，使境內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警察與民眾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反送中運動藉由媒體與網路社群在台灣被廣為傳佈，所呈現議題可區分為下列幾種面向：中共政權介入香港民主、警察執法過當、示威者日趨暴力、台灣如果被中共統一、中國資金入主台灣媒體導致報導偏頗；尤其是「台灣亡國感」此議題，在各傳播平台普遍被使用，因中共政權對於反送中爭議之強硬態度，與習近平所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產生聯想，使部分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局勢具有更強烈的不安全感。（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黃禹禎，2019年10月2日；Chien，2019年9月16日）。

由上述可知，香港反送中運動被台灣媒體與部分民眾解讀為，中國大陸政府極權治理與民主政體矛盾所導致的抗爭行動，為民眾判斷兩岸政治風險的重要議題。根據Beck (1996) 在風險社會理論 (risk society) 中所述，「風險」泛指有一定的機會發生，及發生後對民眾會造成某種程度衝擊的事件；全球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伴隨傳播媒體普及，風險議題的界線逐漸模糊化，導致風險議題影響不僅限於某單一國家、區域，已有向全球化發展的趨勢，風險議題本身包含多元，如政治、疫病、食品安全、氣候變遷風險與經濟風險等。

本研究關切香港反送中運動對台灣政府與人民對兩岸政策支持影響，在風險議題區分上屬於政治風險。政治風險泛指政府機關或利益組織，因經濟、政策變革（財政、投資、貨幣）與政治不穩定（如恐怖主義、暴亂、政變、內戰）等因素，對於機關本身所造成策略、財務、人員流失等危害，此種風險會使政府在執行外交與軍事等能力上面臨困境，政府或機關會制定相關政策與配套，進而降低風險機率 (Chermak, 1992; Kennedy, 1988; Kobrin, 1979)。例如，敘利亞內戰導致歐洲國家陷入難民與恐攻風險，各國為降低未來威脅對本國造成衝擊，因此立法管理移民問題 (Kim & Sandler, 2020)。

以台灣的研究脈絡來說，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台灣民眾越關注電視新聞會認為核能更具有風險，進而越不支持使用核能；以及對核能議題越了解的人，會更加支持使用核能；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政黨認同，也同樣會正向影響對於風險的認知 (陳憶寧，201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再者，傅文成(2018)探討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簽訂服務貿易協定時，民眾質疑立法程序有問題，因而造成「反服貿」社會運動，在研究結果中亦顯示，公眾對於消息來源的信任與關注程度，會正面影響對於簽立服務貿易協定的風險感知，與抵制中國大陸商品的行為意圖。

上述兩篇台灣公眾風險議題研究，兩者皆關切民眾對境外威脅的風險治理，期望政府制定政策，或自身可採取行為，進而降低風險發生。兩者雖考量對媒體關注、消息來源信任程度、知識程度與風險感知對於行為意圖關聯，卻未將民眾處於風險情境時所產生的不安感列入其中考量。

本研究欲了解台灣是否如媒體所報導，產生恐懼與焦慮的「亡國感」，因此延伸探討負向情感層面，了解負面情感對行為傾向的影響。事實上，當民眾處於風險環境時，通常會產生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直覺性的產生好惡情感的判斷，進而影響風險決策的行為(Slovic & Peters, 2006)。

香港反送中事件相較過去的雨傘運動，港人與政府衝突更加嚴重，並且獲得更多國際媒體以及台灣媒體關注(何明修，2019；林祖偉，2019年9月27日)。如此會使公眾更加容易接受此議題資訊，因此，本研究置重點於香港反送中運動，藉由媒體報導，使台灣民眾對於此一國兩制政體產生風險判斷，與影響其情感，進而產生風險預防之行為意圖。

綜上所述，中共政權長期脅迫台灣政府接受「一國兩制」，而香港反送中事件，反映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民主訴願處理方式，使台灣人民能夠借鏡(何明修，2019)。因此，伴隨香港反送中事件衝突升溫，可能會使台灣民眾，更能知覺一國兩制對於民主政體的威脅，進而有負面情感，與支持降低風險的行為產生。

文獻探討

中國大陸政府運用各項方式，使台灣民眾與政府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隨香港反送中事件爆發，港府與港民衝突白熱化，台灣民眾藉由媒體接受相關資訊後，對於中國大陸所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

風險感知、負向情感，以及參與維護民主、支持反對中共政權介入等行為意圖之影響。

兩岸關係與風險社會

由歷史脈絡觀察，兩岸關係會隨領導人不同，使關係時而緊張、時而平緩，但中共對於台灣主權歸屬問題的立場從未改變，例如2016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之兩岸策略為堅決拒絕九二共識，也因此在此段時期台灣與中國大陸政府，停止談話與交流（楊翔丞，2018）。因此，中國大陸不承認台灣在國際上的主權地位，無論於觀光、外交、貿易、體育等事務上，要求台灣政府與誘導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旨在「收復台灣」失土，維護其主權完整性。

舉例來說，台灣國防部報告書（2019）稱中共對於台灣軍事武力演習頻率與強度日益上升，如軍機艦繞台演習、遼寧號航空母艦耐航訓練等，企圖威嚇台灣民眾，使其心中產生恐慌心理；同時運用「惠台政策」，在2019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推出惠台26條政策，優惠台灣中小企業、學界與觀光，並在官方媒體以「灣灣回家吧」等論述，意圖釋出善意使台灣民眾放下對中共統一戒心（李宗憲，2019年11月8日）。

中國古代兵學家孫子曾提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泛指運用謀略與非軍事行動獲取勝利是最佳策略，程國政（2008）稱北京政權上述對台灣策略即是運用謀略、外交手段巧取台灣。進言之，中國大陸積極運用諸般手段，意圖收復台灣主權，促使台灣政府與民眾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此問題對於台灣政府而言，已成為政治風險議題。

風險泛指為，某種危害及發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以及嚴重性（severity），亦即在未來時間點危害所造成威脅（Hansson, 2004）。當探討公眾風險議題時，已無法僅以單一地區討論，須以區域與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風險來討論之，隨著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頻繁，以及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導致訊息傳遞快速、便利，導致風險議題時常牽連著其他區域、國家一起面臨風險（周桂田，2003；Beck, 200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與過去論述科技與科學風險所帶來的衝擊與威脅不同，地緣政治不安定性所導致的政治風險，通常伴隨著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地緣政治關聯性，而對利害關係或地理位置鄰近國家造成損失或威脅，進而使各國政府與民眾進行風險判斷、評估與管理，風險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損失與傷害，通常在越加集權與發展中國家，在國家治理與監管上通常有更高的政治風險 (Campisi, 2016)。

例如，2016年歐洲各國因北非與中東地區內戰與軍事衝突問題，導致歐洲國家捲入難民潮安置與恐怖攻擊風險問題，使民主政府與民眾必須制定相關政策法令，藉以降低區域政治風險對經濟與社會造成的衝擊 (Kim & Sandler, 2020)。在區域性的政治問題下，鄰國或相近地區面對風險威脅時，通常會影響本土公眾對風險的評斷與決策。

又如中國大陸、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領海主權爭議，導致南海區域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升高，使台灣、美國、越南等國家，針對南海區域制定國防與外交政策，避免損失在此海域航行與經濟採集權益 (Creehan, 2012)。藉此，當部分國家發生政治不穩定時，其他國家亦有可能受到牽連。

依本研究脈絡而言，香港民眾因不滿政府修頒逃犯條例，基於對於中國大陸法治的不信任，擔心修法後會被濫用為政治檢控工具，發起為期半年之久的社會運動 (Lee et al., 2019)。BBC中文新聞網2019年11月29日報導，民眾與警察的衝突隨著北京當局與香港政府的支持與背書下，暴力及流血衝突逐漸升級，甚至於11月13日流血衝突從街頭轉換至校園，使香港民主倡議運動逐漸變成暴力衝突，而倡議運動者認為「中國式民主」或「一國兩制」對民主政體有傷害。

此事件在台灣被塑造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以及「台灣亡國感」，主因為中國大陸對於台灣運用各種方式施加壓力，其意圖就是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民眾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吳漢，2020；郭育仁，2020)。

而台灣實行民主制度，總統、地方首長、立法官員、民意代表皆以直接民選方式產生，如政治菁英欲獲取執政權、推動法令政策，須了解民意 (public opinion) 進而獲民眾信任。因此，了解反送中運動對於民眾風險判斷與行為意圖影響，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媒體使用與風險感知

台灣媒體在報導反送中議題時，時常運用「亡國感」與「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將一國兩制視為對台灣侵害的風險框架敘述（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Chien, 2019）。事實上，公眾在日常仰賴傳播媒體獲取資訊並傳遞訊息，本研究所關注議題常被形塑為「亡國」政治風險，其中涉及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區域間的政治角力所牽涉面向甚廣，因此亦容易被媒體報導，進而使民眾更容易注意到此議題（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

過去研究認為當民眾關注風險議題時，通常都藉由媒體的報導來建構對於議題的認知，進而形塑個人對於事件的風險感知，指個人對於特定事件發生可能性與危險性的主觀性評估（Slovic, 2000）。在風險感知研究中，通常在公眾接受風險資訊，產生風險感知與情感評價後，進而有風險預防的行為意圖以及進行風險決策（Paek & Hove, 2017）。

再者，風險議題透過媒體報導後，通常具有建構及形塑民眾風險感知與放大風險感知的效果（Bodemer & Gaissmaier, 2015）。換言之，新聞議題注意程度是感知風險與影響民眾行為意圖的重要指標（Wahlberg & Sjoberg, 2000）。

進一步探討，新聞議題注意程度是形塑民眾風險感知、影響風險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例如傅文成（2018）的研究發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審議過程瑕疵使部分民眾質疑，引發「太陽花學運」，學生與社會團體癱瘓立法院，在此重大社會議題傳播的過程中，電視新聞與網路新聞關注程度較高的大眾，認為此法案會傷害台灣社會、經濟風險感知也較高，同時亦有更高的意願抵制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以及更有意願購買台灣被影響的產品，顯見媒體注意程度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皆有正向關聯性。

再者，根據《2019年媒體白皮書》中顯示，台灣民眾在2016年後，20-59歲年齡的區間，網路觸及率（91.5%）已超越了電視（85.4%）成為民眾主要使用媒體來源，而其中前兩項媒體已大幅超越報紙（24.1%）、廣播（20.3%）、雜誌（20.8%）等傳統媒體，顯見台灣民眾主要資訊接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管道已經逐漸轉向為網路與電視媒體，基於上述論調，本研究分別以電視及網路媒體檢驗，媒體注意程度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的關聯性。以下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 1a：網路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 1b：網路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行為意圖(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支持反中法案等)。

假設 2a：電視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 2b：電視媒體注意程度能正向預測行為意圖(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支持反中法案等)。

媒體在風險事件發生時，扮演民眾判斷風險程度與風險決策時的重要角色(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由於信任通常與風險並存(Williamson, 1993)，因此在台灣亦有學者指出新聞媒體是「準專家」，除提供資訊予民眾外，在風險決策過程中，提供判準參考依據(黃浩榮, 2003；楊意菁、徐美苓, 2012)。事實上，由於媒體所報導真實往往跟社會真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差，媒體機構及記者會依據預存立場篩選報導內容(Zia & Todd, 2010)。因此，民眾處於不確定性高的風險環境時，對於消息來源管道的信任程度，會成為評估風險的重要指標(傅文成、陳靜君, 2017)。

再者，信任感在民眾評估風險與後續風險預防行為時為主要評斷依據(Neff, Chan, & Smith, 2009)。Cook與Cooper(2001)將信任感定義為個人對於其他人、事、物行為表現上的正面認知偏差。媒體信任感，則是公眾對於媒體機構的信任與依賴程度，Jones(2004)將媒體信任歸類於社會資本的一環，泛指個體對於整個媒體社群的信賴感。當民眾對於媒體機構信任程度較高時，亦會更加相信其所傳播之訊息(Bangerter et al., 2012)。

同時，民眾對於媒體信任程度，亦是影響民眾形塑風險的重要因素且多數風險感知與風險傳播研究中都將信任作為解釋變項，因民眾判斷風險或是預防風險時，信任感是對於風險危害的判斷基準。民眾藉由對媒體的信任感，接受媒體平台傳播各種風險議題的知識。

Vijaykumar、Jin與Nowak (2015) 研究H1N1病毒時發現，公眾對於大眾媒體的信任程度越高，對於疾病的威脅評估與焦慮程度有正向關聯；傅文成 (2018) 研究太陽花學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能正向預測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由上述文獻推導中得知，媒體報導內容的不同，導致民眾對於媒體所報導的信任程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進而使對於風險感知程度的不同，以及影響後續行為意圖。

回到本研究脈絡，民眾藉由傳播媒體報導，得知香港反送中運動議題，所產生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風險感知與「反中」行為意圖。文獻爬梳發現，個體在接受公眾議題，媒體信任程度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因素，對於風險評估判斷有重要的影響力，通常對媒體信任程度越高，也會有越高程度的風險感知，同時在迴避風險行為意圖部分，也有較高的支持程度。

因此檢視媒體注意程度與媒體信任感，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關聯性，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a：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 3b：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行為意圖。

風險感知與負面情感

當個體處於風險情境時，除了理性思考外，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情感，風險感知程度與情感對於風險預防行為皆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探討風險因子對民眾決策行為影響時，不應僅局限於認知層面的探討，亦須列入對於風險的情感評價 (Coleman, 1993; Dunwoody & Neuwirth, 1991)。如此，能夠了解當公眾處於風險情境時，情感與理性思考因素對決策行為的影響。

情感相較理性認知不同，當人們感受到危機時，運用情感是引導受眾判斷風險的因素，進而導致不同的風險決策行為 (Finucane et al., 2000; Mitchell, 2019)。人們當認知到風險是自身無法控制狀態下，會產生負面情感，此因素為影響風險決策的重要影響因子 (Loewenstein et al., 200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進一步來說，人們遇到風險時多半伴隨著恐懼、焦慮等負面情感，並且因為負面情感程度的差異，在後續採取風險預防措施或政策支持上會有不同程度的行為意圖(Loewenstein et al., 2001; Peters & Slovic, 1996)。換句話說，公眾在覺知風險後，產生的恐懼和擔憂等情感，進而對採取保護行動的行為意圖有直接的影響(Huijts, Molin, & Steg, 2012; Prati, Pietrantonio, & Zani, 2012)。

Rhodes (2017) 研究行車安全風險與遵守法規的行為意圖時發現，當公眾對風險感知程度較高時，會產生負面的情感(焦慮與恐懼)，能夠正面預測受測者想要遵守法令規章的行為傾向與車禍防治法規的政策支持。Huddy、Feldman、Taber與Lahav (2005) 等學者研究美國民眾對反恐戰爭風險政策支持時發現，民眾境內恐怖攻擊風險感知高，會有較負面的情感(恐懼與焦慮)，進而影響民眾對反恐戰爭政策支持，結果發現民眾對於情感越趨向負向時，對於政策支持程度越高。當處於風險情境下時，在感知風險後與採取決策前，情感因素亦是重要影響的因子(Slovic et al., 2005)。換言之，在台灣民眾感知中國大陸對民主政體的恫嚇與威脅而產生負面的情感，可能影響民眾在政策支持上的判準。

根據杜聖聰等(2019)運用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於2019年5月10日至8月7日，網路搜尋「亡國感」聲量為16,315則，並且推論部分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產生焦慮與恐懼情感。因此本研究認為焦慮與恐懼的負向情感在民眾的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之間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以下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4：負向情感對於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中介效果。

知識與風險判斷

風險是描述公眾處於不確定性的狀態，處於不確定性風險時，人們時常運用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來衡量危害的程度，進而影響對於政策上的選擇偏好，藉以減少風險發生(Williams & Baláž, 2012)。知識是預測風險感知的重要因子，由於知識理論是更能預測風險感知的主要變項，人們對風險的反應取決於他們的知識水平(Wildavsky & Dake, 1990)。

探討民主國家的政治風險領域，政治知識對公眾風險判斷、政策偏好以及政治參與有正向關聯性，換言之，知識程度越高，通常會有越高的風險感知程度，使公眾更支持迴避風險的政策，以及更有意願參與政治活動或政治表態 (Campbell, 2013)。

再者，Williams與Baláz (2012) 綜整移民風險與政治知識對移民政策支持偏好，其中將政治知識與風險部分，歸納為公眾的社會維度 (social dimension) 構面，為個人政策偏好的判準 (policy preference)，如對移民議題知識程度較高，以及風險感知程度高，會有越高的意願參與投票或聯署等政治行為。

此外，人們擁有的客觀風險知識越多，作出的風險判斷就越正確 (傅文成，2018；Lin & Bautista, 2017)。議題相關知識，也就是實際測量人們對社會風險議題了解了多少。本研究探討香港政府修頒逃犯條例所引起爭議運動，台灣民眾是否會因對事件知識程度不同而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不同的風險感知，進而影響行為意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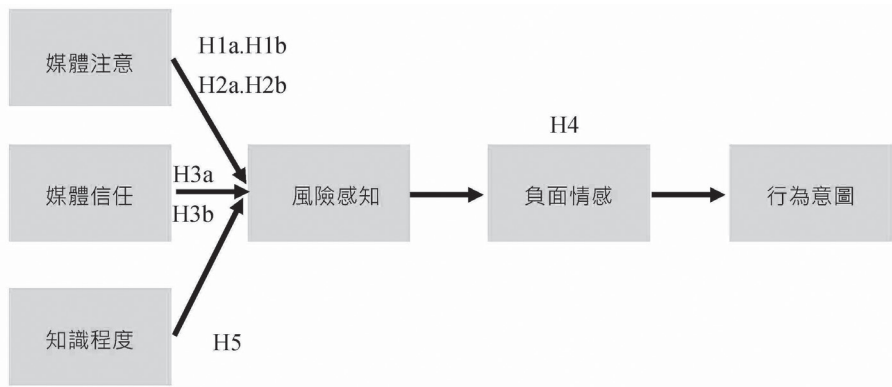
假設5：台灣民眾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知識的程度越高，其風險感知、行為意圖越高。

最後，人口統計變項是許多風險研究都不可忽視的控制變項，例如性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等因素均會影響群眾的風險感知 (陳憶寧，2014)。林宗弘等人 (2018) 研究台灣各階層民眾對於不同風險認知與因應，結論發現對於「人禍」分類中的食品安全風險，高教育程度、中壯年與女性民眾，基於資訊獲取容易與可能受害心理，而有較高的風險感知。其次，兩岸關係隨執政黨輪替而有所不同，因此探討兩岸議題時，政黨傾向似乎無可避免的成為影響民眾對中國介入民主風險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為聚焦媒體注意、媒體信任、知識程度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影響，因此將性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等人口變項列為控制變項。

總言之，本研究聚焦於台灣民眾藉由媒體接收香港反送中運動資訊後，如何因自身媒體注意、媒體信任、知識程度，影響其情感及行為意圖。研究架構如圖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方法

抽樣與調查進行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網路自填式問卷施測。調查時間為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進行問卷前測。於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起，至2019年11月18日止(星期一)，合計七天執行問卷發放。正式施測時為反送中運動爆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衝突期間，香港警方與抗爭者激烈衝突引起媒體相當程度的報導。

運用滾雪球式抽樣，在社群網站(Facebook、Dcard、PTT、Line)等各大社群平台發布調查問卷鏈接，運用抽賣場禮券100元50名，詢問民眾電子郵件並留下獲得問卷渠道，如是運用轉傳功能獲得並填答成功者，則會留下兩筆以上電子郵件，藉由抽獎誘因觸及更多民眾。例如：請問您是否願意參與抽獎(是/否)?若填答是者，會追問受試者電子郵件，以便公布抽獎結果。在轉傳部分，詢問「請問您是從何種渠道獲得此問卷(社群網站看見、親友轉傳)?」如填答親友轉傳者，會協請留下親友的電子郵件，以便進行資料比對。並在問卷系統上，限制同一載體僅能填答一次，避免同一受試者重覆填答疑慮。

本次問卷調查合計取得520個有效樣本，以台灣18歲至60歲民眾為主。本研究依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西元2019年人口靜態統計」數據中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進行反覆加權。加權結果母體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一：

表一 受測者人口特性

性別	男性 N = 257	女性 N = 262				
年齡	18-19歲 N = 39	20-29歲 N = 97	30-39歲 N = 111	40-49歲 N = 116	50-59歲 N = 113	60歲以上 N = 42
教育程度	國小 N = 42	國中 N = 62	高中(職) N = 157	大學(專) N = 204	碩博士 N = 53	
政黨傾向	泛藍 N = 123	泛綠 N = 177	其他 N = 2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測量變項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自變項為媒體信任、媒體注意程度，對於香港反送中知識等。依變項包含風險感知、行為意圖、負面情感、政策支持度。以下依序說明自變項之測量方式以及問卷各構面之信度分析。

I. 媒體注意程度

本研究詢問受測者媒體注意程度包含網路與電視新聞兩種面向，以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從不關注」、「偶爾關注」、「不太關注」、「有些關注」、「時常關注」、「非常關注」，檢測受測者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所運用媒體平台。題項為「請問您從網路新聞(如PTT、Dcard、Facebook、Twitter、Line、YouTube、udn新聞網、蘋果新聞網、中時電子報、自由電子報)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請問您從電視新聞(如新聞節目、政論節目)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填答數值越大代表媒體注意程度越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II. 媒體信任程度

本研究參照Bangerter等學者(2012)檢測媒體信任程度量表，運用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檢測受測者對於網路與電視媒體的信任程度，填答非常不同意者代表其對於媒體信任程度越高，相反若填答偏向非常同意者其媒體信任程度越低。建構媒體信任程度將四題加總平均，所得分數越低，表示媒體信任的程度越高。

媒體信任變項共四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為.79，屬具可接受範圍之信度。

III. 知識變項

知識變項部分共計三題，參照香港立法會公布條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治亂方針與民陣團體五大訴求，答題者認為「正確」編碼為1，「不正確」編碼為2。題目依序為「修訂後的逃犯條例，香港政府引渡逃犯至中國司法審理時，需經過香港立法會同意」、「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在反送中事件中，對待示威者是和平理性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五大訴求，其中一條包含香港獨立」。上述題目之標準答案為「不正確」(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

IV. 風險感知變項

研究者參考Paek與Hove(2017)設計量表，以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檢測受測者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程度。建構風險感知變項的方式，是將六題加總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者代表其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風險感知變項共六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5，屬具可接受之信度。

V. 負面情感變項

在負面情感方面，研究者參考Prati等人(2012)負面情感量表，詢問「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擔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看見『香

港反送中事件』後，我害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所得分數越高，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情感越負面。

將兩項分數加總後平均，用以建構負面情感變項，所得分數越高代表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情感越負面，共兩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3，屬具可接受之信度。

VI. 行為意圖變項

行為意圖變項部分，研究者參考傅文成(2018)調查反服貿量表設計，以Likert 6點量表，1至6點分別為「非常不可能」、「不可能」、「不太可能」、「有點可能」、「可能」、「非常可能」檢測受測者對於支持民主運動行為意圖。建構行為意圖變項，將三項分數加總後平均除以3，所得分數越高代表對於支持民主社會運動行動意圖越高。行為意圖變項共三題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1，屬可接受範圍之信度。

VII. 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人口統計與其他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年齡部分為開放填答，再由研究者重新歸類為：18-19歲、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測量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自修、未受小學教育、小學肄業、小學畢業)」、「國初中(中學肄業、中學畢業、初職)」、「高中職(高中普通科、高中職學校、高職、士官學校、五專)」、「大學與大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專科班、空中行專、空中大學、軍警官校或大學、技術學院、科大、大學)」、「碩博士(碩士畢、博士)」，填答「其他」選項者派定為遺漏值；而政黨傾向以非選舉時期整體而言較支持哪一個政黨，「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民進黨、台聯黨、台灣基進)」，填答「其他」選項者派定為遺漏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研究結果

描述性統計

接續針對媒體注意程度、媒體信任程度、風險感知、負面情感、客觀知識、行為意圖等，各題項執行描述性統計，詳細結果如表二。

表二 測量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題項	<i>M</i>	<i>SD</i>
媒體注意程度	請問您從網路新聞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	4.66	1.32
	請問您從電視新聞關注香港反送中事件程度。	3.44	1.57
網路媒體信任程度	網路新聞誇大了反送中運動，中國介入台灣民主的風險。	2.66	1.67
	人們不能相信網路上關於反送中事件的報導。	2.57	1.37
電視媒體信任程度	電視新聞誇大了反送中運動，中國介入台灣民主的風險。	2.67	1.60
	人們不能相信電視上關於反送中事件的報導。	2.86	1.47
風險感知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十分高風險的。	4.9	1.46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機率會干預台灣民主。	4.79	1.56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我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非常有可能對台灣帶來嚴重問題。	4.97	1.44
	如果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對台灣將是嚴重的威脅。	5.18	1.31
	如果實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將嚴重威脅台灣民主。	5.14	1.36
	如果「香港反送中事件」與中共介入民主政權有關，將危害台灣民主。	4.84	1.51
負面情感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擔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4.67	1.63
	看見「香港反送中事件」後，我害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4.62	1.61
行為意圖	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我可能會更願意參與聲援香港的民主的社會運動(連署、遊行、捐款、連儂牆等)。	4.18	1.66
	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我可能會更願意支持維護民主的社會運動。	4.59	1.50
	我未來可能會支持「反對中國介入民主政權」相關政策。	4.79	1.51

媒體注意程度部分，網路媒體受測者回答「非常關注」有39.1%、「時常關注」有12.8%、「有些關注」有12.7%、「不太關注」23.8%、「偶爾關注」8.8%、「從不關注」2.8%；電視媒體方面，回答「非常關注」有13.3%、「時常關注」有9.9%、「有些關注」有12.8%、「不太關注」29.9%、「偶爾關注」22.1%、「從不關注」12%。可得知透過網路媒體注意香港反送中議題的比例較電視媒體更高。顯見網路媒體在傳播香港

反送中議題時，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數據有過半的閱聽人從網路媒體獲得相關資訊。

媒體信任程度，各題項平均數值普遍較低，亦即無論在網路或電視平台，民眾對反送中的媒體信任程度較高。其次，反送中運動知識方面，詢問關於條例條文「修訂後的逃犯條例中，香港政府引渡逃犯，涉及特別法案需至中國司法審理時，需經過香港立法會同意」，受測者回答正確的有66.8%；針對民陣團體訴求知識部分「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五大訴求，其中一條包含香港獨立」，受測者回答正確的有74.5%；中國大陸政府態度知識「中國大陸及香港政府在反送中事件中，對待示威者是和平理性的」，受測者回答正確的有86.8%。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與香港政府處理態度的知識程度，高於對香港民陣團體提出五大訴求，而對修正條文知識程度較低。

對於風險感知部分，各題項平均數偏高，代表民眾對於一國兩制風險有較高的風險感知程度；負向情感部分，各題項平均數偏高，代表民眾對於一國兩制風險有較負面的情感。最後，受測者對於行為意圖部分，受試者在行為意圖部分普遍有較高的意願支持聲援香港、支持民主社會運動與支持反對中國因素介入民主等相關政策。

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與PROCESS分析模組，驗證本研究假設，分析自變項（媒體注意程度、媒體信任程度、知識程度）與依變項（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支持民主運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行為意圖）之間關聯性，並控制人口統計變項（性別、教育程度、政黨傾向）之影響。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假設驗證步驟：

I. 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分別驗證媒體注意程度會正面預測風險感知，與支持民主運動的行為意圖。結果顯示，網路注意 ($\beta = .32, p < .001$) 與風險感知具有顯著相關，電視注意 ($\beta = .02, p = .63$) 則無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著關聯性；與行為意圖關係部分，網路注意 ($\beta = .41, p < .001$)，電視注意 ($\beta = .03, p = .44$)，僅網路注意存在顯著預測性，電視注意則無預測力。

以上敘述可以得知，僅研究假設1(網路注意)獲得支持。由過去研究Lin、Li與Bautista(2017)，媒體為民眾判斷風險的重要渠道，因此媒體使用程度越高，其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此論點在本研究也獲得支持。再者，傅文成(2018)研究民眾對於服務貿易協定簽署研究中，除探討媒體使用與風險感知之相關性外，亦將行為意圖列入為依變項，民眾於各媒體使用上均獲得支持；然而，本研究驗證僅在網路注意部分獲得支持。本研究假設相關分析數據詳見表三。

表三 風險感知階層迴歸表

變項	風險感知				行為意圖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Step 1 :								
性別	.11*	.08*	.07	.07	.20***	.17***	.16***	.16***
年齡	.16***	.12**	.09*	.10	.13**	.08*	.06	.06
政黨 傾向	.04	.06	.05	.05	.03	.06	.04	.04
教育 程度	.01	-.01	-.01	-.02	-.05	-.07	-.07*	-.06
Step 2 :								
網路 注意		.43***	.33***	.32***		.50***	.40***	.41***
電視 注意		-.01	.02	.02		.00	.03	.03
Step 3 :								
媒體 信任			-.29***	-.27***			-.28***	-.31***
Step 4 :								
客觀 知識				-.06				.08*
R^2	.03	.21	.29	.29	.05	.30	.37	.37
Adj R^2	.03	.20	.28	.28	.05	.29	.36	.36
F	4.5**	22.9***	29.2***	25.8***	7.2***	35.8***	42.2***	37.7***
df	(516,4)	(514,6)	(513,7)	(512,8)	(516,4)	(514,6)	(513,7)	(512,8)

註：N = 520，* $p < .05$ ；** $p < .01$ ；*** $p < .001$

研究假設3a與3b部分，驗證台灣民眾媒體信任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及行為意圖。分析結果發現，媒體信任程度越高，則有越高的風險感知 ($\beta = -.27, p < .001$)；與行為意圖方面亦有顯著正相關 ($\beta = -.31, p < .001$)。因此，可以得知研究假設3成立。

Neff等人(2009)研究發現當民眾面臨不確定性的外在環境時，對媒體的信任感會成為感知風險與判斷風險的重要依據，為作出風險防範措施的重要判準。本研究調查結果均支持過去研究，證明民眾對於媒體的信任程度，與對於風險感知與其行為意圖皆呈現正面預測關係。

研究假設5，驗證香港反送中事件知識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及行為意圖。結果發現，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的知識程度僅對行為意圖 ($\beta = .08, p = .04$) 有顯著關聯；風險感知部分則無關連程度 ($\beta = -.06, p = .18$)。Wildavsky與Dake(1990)認為人們對於風險的反應多半取決於他們對於風險議題的知識水平，其次傅文成(2018)研究服貿協定風險議題時，發現民眾對於議題的客觀知識與風險感知、行為意圖無顯著關聯，本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部分符合，因此研究假設5僅獲得部分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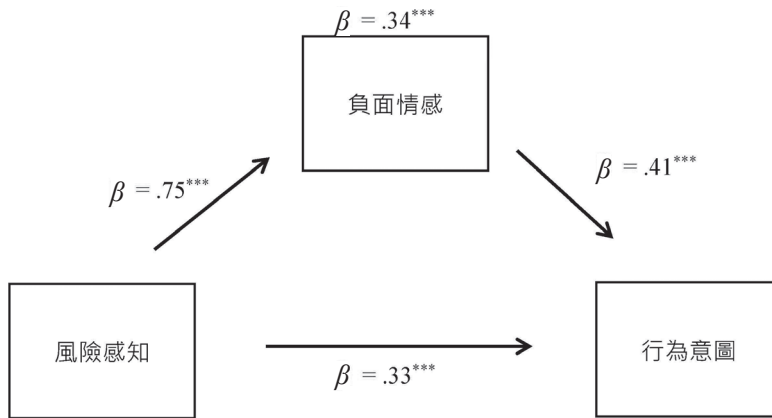
II. 中介效果分析

根據Hayes(2009)敘述過去Baron與Kenny(1986)中介檢定方式較缺乏統計效力，需仰賴其他檢定方式檢測其中介效果，本研究採用Hayes(2017)PROCESS套件Model 4分析研究假設4。其中運用拔靴法(Bootstrap)，計算潛在變項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量，以檢驗中介效果。此種方式可藉由多次路徑估算結果，形成間接效果的分配，進而計算出間接效果之信賴區間(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如信賴區間上界與下界，未包含0，則具有中介效果(MacKinnon, 2008)。Lau與Cheung(2012)運用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值，判定無中介效果、部分中介與完全中介效果，如Boostrapping間接效果值95%信賴區間包含0值，代表無中介效果；如間接效果值95%信賴區間未包含0值，再者直接效果包含0值，則代表完全中介效果；如間接效果、直接效果與總效果值皆未包含0值，則代表為部分中介效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本研究風險感知為自變數(X)，負面情感為中介變數(M)，行為意圖為依變數(Y)，如圖二所示，控制人口統計變項後，三者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mediating effect)。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的中介效果分析，結果顯示，間接效果部分達顯著水準($\beta = .34$, 95% CI [0.24, 0.45])，且在風險感知對行為意圖的直接效果($\beta = .33$, 95% CI [0.27, 0.47])，以及總效果($\beta = .65$, 95% CI [0.65, 0.79])皆達顯著水準，並且其95%信賴區皆未包含0值，因此推論研究假設4成立，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存在部分中介效果，詳細分析數據如表四。

圖二 負面情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之中介關係



換言之，民眾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具有越高的風險感知，其情感亦趨於負向，進而間接導致民眾具有更高支持香港反送中以及支持民主運動之行為意圖。Huijts等人(2012)以文獻回顧方式綜整，民眾對於能源科技的風險感知以及如何形塑其態度與行為意圖關係，推論情感對於新興能源的風險感知，以及接受風險預防措施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作者也建議能將此模型運用於各項風險情境中，本研究也驗證此模型部分。

表四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行為意圖」之中介關係分析表

變數間影響路徑	β	95% 信賴區間	
		p值	BC上下界
間接效果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34	< .001	[0.24, 0.45]
直接效果			
風險感知→負面情感	.75	< .001	[0.84, 0.98]
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41	< .001	[0.30, 0.47]
風險感知→行為意圖	.33	< .001	[0.27, 0.47]
總效果			
風險感知→行為意圖	.65	< .001	[0.65, 0.79]

註：N = 520，Bootstrap 次數為 5000。 β 為標準化迴歸係數。當 95% CI 與 95% boot CI 區間未包含 0，代表具有顯著效果

結論與討論

香港反送中運動，使示威者不滿情緒不斷升高主因，來自北京與香港政府強硬應對方式，導致鎮壓與示威的暴力手段不斷升級，使香港部分民眾感受逐漸喪失民主政體。中共在 2019 年多次對台灣當局喊話，要其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民眾也產生不同立場，部分民眾認為，如台灣與香港一樣接受一國兩制，造成強烈的亡國感。

本研究最主要目的在於檢驗台灣民眾的媒體信任、媒體注意程度、知識程度，是否會影響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負面情感，以及支持維護民主運動、立法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等相關的行為意圖，藉此了解中共或香港政府處理香港議題時，對於台灣民眾之影響。此外，本研究重要之處在於，正式問卷調查時，示威者與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爆發激烈衝突期間，引發各地媒體與社群平台高度關注與討論，更能了解民眾對與此議題的關注程度與影響風險感知及行為意圖。

本研究分析結果，從網路媒體注意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民眾，對中共政權企圖干預台灣民主政體的風險感知有顯著的正相關，亦能正面預測後續行為意圖；然而，在電視媒體部分，對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間無顯著關聯性。過去社會風險議題研究，網路與電視媒體對於民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的風險感知的行程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然而，本研究電視媒體注意程度無法預測民眾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僅網路新聞注意程度對形塑民眾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有所影響。

雖本研究結果與過往有所差異，然而事實上，網路媒體已經被視為民眾接觸政治議題的重要媒介，其原因在於能增加民眾接觸公共事務資訊機會，並且表達己身意見，以達到資訊交換、公共討論等公民參與過程外，亦使民眾能建立認同與集體行動(王泰俐，2013；王嵩音，2017；林宇玲，2014)。

更進一步來探討，社群網站使用普及化後，除使公眾能更加容易在網路上獲得、評論與分享資訊外，傳統媒體亦會運用網路資訊為新聞來源，此方式衝擊過往守門過程，使資訊管道更多項，民眾亦能在網路進行動員，驅使政治參與的行動(劉時君、蘇蘅，2017；Ems, 2014; Willams & Gulati, 2013)。

網路媒介如一把雙面刃，雖能便捷傳遞訊息與發表言論，但同樣使假訊息迅速流竄，因此作者為避免受測者對議題存有錯誤認知，而產生研究偏誤；因此將政治知識與媒體信任程度共同列入研究變項探討。

媒體信任程度越高的民眾亦能正面影響其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以及支持維護民主社會運動的行為意圖。媒體在傳播議題與形塑群眾對於政治行為與選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李韋廷，2008)，本研究的媒體信任程度構面假設均獲得支持。Lin與Bautista(2016)，研究新加坡民眾的媒體信任與霾害威脅感如何影響行為意圖時，也發現無論是傳統媒體或網路媒體，民眾大多以媒體報導內容作為評斷威脅程度的依據。

再者，傅文成(2018)研究服務貿易風險協定時，媒體信任程度均能預測後續的風險感知程度，以及後續的風險接受程度及政策支持。進言之，本研究也再次驗證過去的研究架構與理論，也支持Neff等人(2009)提出信任是民眾評估風險的重要依據。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在此議題的媒體信任程度上，明顯高於以往研究調查。據2020年〈Digital News Report〉調查報告顯示，僅有24%台灣民眾信任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在結果分析時發現，其原因為新聞媒體充斥假新聞報導；2019年台灣新聞媒體可信度研究顯示，台

灣民眾面對於政治性與國際新聞議題信任程度較低，但考量公眾的政治立場時，其新聞議題信任程度會相對提升。因此作者基於此論點運用政黨傾向與媒體信任程度，執行ANOVA單變量分析，結果確實發現泛綠政黨對此議題的媒體信任程度，顯著高於泛藍政黨與其他（選人不選黨、無政黨立場等）。其對於媒體信任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依序為：泛綠政黨（1.976分）>其他（2.79分）>泛藍政黨（3.55分）。因此，本研究與以往調查不同之處，可能因為針對特定政治議題的信任程度，在政治立場上影響會更加明顯，故未來研究政治風險相關議題時，可先詢問受訪者政治原有立場進行交叉比對，以探究政黨傾向在整體風險傳播機制的影響。

檢驗知識變項部分，詢問對於香港逃犯條例修正條文與陳抗民眾五大訴求等香港反送中運動重要議題，公眾對於此議題的了解程度，三題項回答正確率均達六成以上，顯示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議題知識部分，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而，本研究驗證變項間關聯性時，發現反送中運動的知識程度與風險感知間無顯著關聯性。

結果有別於過去社會風險議題研究結果，導致原因可能為民眾透過媒體接受具有風險議題資訊時，時常依據內容不同，選擇較為符合個人立場的媒體，然而媒體亦是民眾接受知識的來源，對於議題本身持有偏頗，不易了解事件全貌與深入探究修訂逃犯條例相關法案條文，或熟記民陣團體所提出五大訴求等較生澀內容，因而導致未能正面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針對研究結果，民眾對於反送中運動議題知識，未能預測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風險感知，僅對反送中政策支持與社會運動參與傾向有正向關聯，與探討知識與科技或能源風險研究結果相左。其原因在於研究科技能源風險時，所論述知識變項多數運用風險所造成的危害與結果，因此通常對該項科技風險知識程度越高，則對於風險感知識題會有所關聯（陳憶寧，2014）。

然而，本研究所探究為政治風險議題，在本質上與科技風險有所區別，政治知識通常為公眾對於政策支持偏好或行為參考之判準，與風險感知屬個人對於風險議題的理性認知層面不同（Campbell, 2013）。此外，研究者在題目設計上針對反送中事件，而非針對一國兩制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體，因此可能導致受試者對於反送中運動知識程度高，並不能預測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風險感知，僅會些微影響民眾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支持與聲援行為傾向。

再者，研究者推論導致與過去研究差異的主因為中共政權近年來，在國際上不承認台灣的主權地位，並要求其承認一國兩制政體框架，使兩岸統獨已經是高度政治社會化的議題，對於台灣人而言已經是普及的議題。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測量公眾對於政治風險的主、客觀知識程度，以及過往個人對於議題的經驗，對於風險感知以及行為意圖的影響，從而運用政治風險觀點更加了解政治知識、風險感知與政治決策三者間的關聯性。

研究者接續檢測負面情感對於風險感知、行為意圖間的中介關係時，發現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根據國外研究發現，在政府推行反恐政策時，對於恐怖攻擊與恐怖份子感到焦慮與恐懼的群眾，具有較高政策支持程度(Huddy et al., 2005)，本研究探討兩岸政治風險時亦有同樣結果。進言之，當民眾由香港反送中運動感受到一國兩制威脅後，產生負面情感回應，進而有意願參與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政治活動，以及對反對中國大陸介入台灣的政策支持程度。換句話說，當民眾在網路媒體上關注此議題程度越高，對於一國兩制風險、負向情感與行為傾向的正向關聯，也呼應本研究「亡國感」的主題。

本研究設定在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示威者與香港政府警察對峙白熱化期間，主要貢獻為民眾注意香港反送中議題後，對於中共宣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對於此兩岸政治風險具有何種的感知程度、負面情感及支持民主運動與反對中共介入台灣政體的行為意圖。

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部分，研究以滾雪球方式抽樣，實施網路問卷調查法，對於抽樣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偏誤。過去在網路民意調查限制上，會觸及民眾可能對於此事件就已存在既定的政治立場。李政忠(2004)將網路調查的限制歸納為兩項，網路調查者偏向特殊使用族群組成；再者，運用網路的行為與經驗，對於事件存在特定的立場與態度。例如台灣網路使用調查，使用網路的年齡族群分布，其中以年輕族群偏多，可能會造成調查樣本過於傾向同群集偏誤。最後，相較傳統電話調查，網路調查具匿名性，因此更易使公眾對於政治議

題表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中能夠運用不同調查方式與抽樣，盡可能降低抽樣上所造成的誤差。

再者，此研究調查期間適逢台灣選舉期間，對於香港反送中議題，容易因為媒體既有的報導框架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容產製，並且在近年「假訊息」問題逐漸發酵，建議未來研究對於不同期間媒體報導框架部分與媒體信任可區分媒介頻道、平台，驗證民眾對於此議題的認知程度，以及媒體或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

最後，台灣人民的統獨意識與國家認同，對於兩岸關係政策的認知上，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因此建議後續進行兩岸政治風險實證研究時，可將兩者列入考量，探討是否會影響中共對台灣的感知風險程度。未來可檢驗民眾在談論香港反送中事件時，「亡國感」等負面報導頻率，是否會產生此現象使民眾對於中共威脅產生麻痺，進而減少對於支持民主運動、政策等行為意圖。

註釋

- 1 1984年香港確定回歸中國後，由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方針。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BBC 中文新聞網 (2019年11月29日)。〈香港理工大學「圍城」解除封鎖：一文看懂13天裏發生了什麼〉。BBC NEWS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11月8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586178>。
- BBC Zhongwen xinwen wang (2019, November 29). Xianggang Ligong daxue “weicheng” jiechu fengsuo: Yiwen kandong 13 tian li fasheng le shenme. BBC NEWS Zhongwen wang.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586178>.
- Chien, A. M. (2019年8月21日)。〈香港「反送中」催化台灣社會紅色恐懼〉。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8月21日，取自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821/hongkong-taiwan-fury-fallout-presidential-race/zh-hant/>。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Chien, A. M. (2019, August 21). Xianggang “fan songzhong” cuihua Taiwan shehui hongse kongju. Niuyue shibao Zhongwen wang. Retrieved August 21, 2019, from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821/hongkong-taiwan-fury-fallout-presidential-race/zh-hant/>.
- MAA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 (2019)。《2019年MAA台灣媒體白皮書》。台北：MAA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
- MAA Taibeishi meiti fuwu dailishang xiehui (2019). *2019 nian MAA Taiwan meiti baipishu*. Taipei: MAA Taibeishi meiti fuwu dailishang xiehui.
- 王泰俐 (2013)。〈「臉書選舉」? 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社群媒體對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1期，頁1-52。
- Wang Taili (2013). “Lianshu xuanju”? 2012 nian Taiwan zongtong daxuan shequn meiti dui zhengzhi canyu xingwei de yingxiang. *Dongwu zhengzhi xuebao*, 31, 1-52.
- 王泰俐 (2019)。〈假新聞與民主危機〉。《台灣民主季刊》，第16期，頁155-161。
- Wang Taili (2019). Jia xinwen yu minzhu weiji. *Taiwan minzhu jikan*, 16, 155-161.
- 王嵩音 (2017)。〈社交媒體政治性使用行為與公民參與之研究〉。《資訊社會研究》，第32期，頁83-112。
- Wang Songyin (2017). Shejiao meiti zhengzhi xing shiyong xingwei yu gongmin canyu zhi yanjiu. *Zixun shehui yanjiu*, 32, 83-112.
- 中華民國國防部 (2019)。《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
- Zhonghua Minguo Guofangbu (2019). *Zhonghua Minguo 108 nian guofang baogao shu*. Taipei: Guofangbu.
- 李政忠 (2004)。〈網路調查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建議〉。《資訊社會研究》，第6期，頁1-24。
- Li Zhengzhong (2004). Wanglu diaocha suo mianlin de wenti yu jieju jianyi. *Zixun shehui yanjiu*, 6, 1-24.
- 李韋廷 (2008)。《審議式民主與大眾傳播媒體新角色初探》。台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Li Weiting (2008). *Shenyi shi minzhu yu dazhong chuanbo meiti xin juese chutan*. Taiwan zhengzhi daxue Zhongshan renwen shehui ke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 李宗憲 (2019年11月8日)。〈中國對台「26條」新舉措：央視喊話「灣灣回家吧」能否贏得民心〉。BBC NEWS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11月8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343205>。

- Li Zongxian (2019, November 8). Zhongguo dui Tai “26 tiao” xin jucuo: Yangshi hanhua “Wanwan huijia ba” nengfou yingde minxin. BBC NEWS Zhongwen wang. Retrieved November 8,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343205>.
- 吳介民、廖美 (2015)。〈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第29期，頁89-132。
- Wu Jiemin, Liao Mei (2015). Cong tongdu dao Zhongguo yinsu: Zhengzhi rentong biandong dui toupiao xingwei de yingxiang. *Taiwan shehui xuekan*, 29, 89-132.
- 吳漢 (2020)。〈2019年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展望與探索月刊》，第18期，頁8-22。
- Wu Han (2020). 2019 nian liangan guanxi huigu yu zhanwang. *Zhanwang yu tansuo yuekan*, 18, 8-22.
- 何明修 (2019)。《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台北：左岸文化。
- He Mingxiu (2019). *Weishenme yao zhanling jietou? Cong Taiyanghua, Yusan, dao Fansongzhong Yundong*. Taipei: Zuoan wenhua.
- 杜聖聰 (2019年08月12日)。〈一個亡國感、兩種辛酸淚……大數據告訴你韓國瑜為什麼有亡國感〉。大數聚。上網日期：2019年08月12日，取自 https://group.dailyview.tw/article/detail/1306?fb_comment_id=2513961985308505_2523353321036038。
- Du Shengcong (2019, August 12). Yige wangguo gan, liangzhong xinsuan lei... Dashuju gaosu ni Han Guoyu weishenme you wangguo gan. Dashuju. Retrieved August 12, 2019, from https://group.dailyview.tw/article/detail/1306?fb_comment_id=2513961985308505_2523353321036038.
- 周桂田 (2003)。〈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台灣社會學刊》，第31期，頁153-188。
- Zhou Guitian (2003). Cong “quanqiu hua fengxian” dao “quanqiu zaidi hua fengxian” zhi yanjiu jinlu: Dui Beike lilun de pipan sikao. *Taiwan shehui xuekan*, 31, 153-188.
- 林宇玲 (2014)。〈網路與公共領域：從審議模式轉向多元公眾模式〉。《新聞學研究》，第118期，頁55-85。
- Lin Yuling (2014). Wanglu yu gonggong lingyu: Cong shenyi moshi zhuanxiang duoyuan gongzhong moshi. *Xinwen xue yanjiu*, 118, 55-8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林宗弘、蕭新煌、許耿銘(2018)。〈邁向世界風險社會？台灣民眾的社會資本，風險感知與風險因應行為〉。《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40期，頁127-166。

Lin Zonghong, Xiao Xinhuang, Xu Gengming (2018). Maixiang shijie fengxian shehui? Taiwan minzhong de shehui ziben, fengxian ganzhi yu fengxian yinying xingwei. *Diaocha yanjiu—Fangfa yu yingyong*, 40, 127-166.

林祖偉(2019年9月16日)。〈香港反送中100天：如何從遊行變成暴力衝突？〉。BBC NEWS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9月16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extra/Fy2CQzQkHZ/hong-kong-protests-100-days-on>。

Lin Zuwei (2019, September 16). Xianggang Fansongzhong 100 tian: Ruhe cong youxing biancheng baoli chongtu? BBC NEWS Zhongwen wang.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extra/Fy2CQzQkHZ/hong-kong-protests-100-days-on>.

林祖偉(2019年9月27日)。〈香港佔中五週年：從雨傘運動的「和理非」到「反送中」的「勇武」〉。BBC NEWS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9年9月27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753070>。

Lin Zuwei (2019, September 27). Xianggang Zhanzhong wu zhounian: Cong Yusan Yundong de “he li fei” dao “Fansongzhong” de “yongwu.” BBC NEWS Zhongwen wang.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753070>.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2018年台灣網路報告》。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Caituan faren Taiwan wanglu zixun zhongxin (2018). *2018 nian Taiwan wanglu baogao*. Taipei: Caituan faren Taiwan wanglu zixun zhongxin.

陳憶寧(2014)。〈福島危機中台灣民眾對核能的風險感知與態度：政黨傾向、核能知識，信任與科學傳播的角色〉。《中華傳播學刊》，第26期，頁223-265。

Chen Yining (2014). Fudao weiji zhong Taiwan minzhong dui heneng de fengxian ganzhi yu taidu: Zhengdang qingxiang, heneng zhishi, xinren yu kexue chuanbo de jue.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26, 223-265.

郭育仁(2020)。〈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台灣的戰略機遇與挑戰〉。《全球政治評論》，第70期，頁1-6。

Guo Yuren (2020). Cai Yingwen zongtong di er renqi: Taiwan de zhanlüe jiyu yu tiaozhan. *Quanqiu zhengzhi pinglun*, 70, 1-6.

- 黃浩榮 (2003)。〈風險社會下的大眾媒體：公共新聞學作為重構策略〉。《國家發展研究》，第3期，頁99–147。
- Huang Haorong (2003). Fengxian shehui xia de dazhong meiti: Gonggong xinwenxue zuwei chonggou celüe. *Guojia fazhan yanjiu*, 3, 99–147.
- 黃禹禎 (2019年10月2日)。〈香港反送中大事記：一張圖看香港人怒吼的231天〉。報導者。上網日期：2019年10月2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events>。
- Huang Yuzhen (2019, October 2). Xianggang Fansongzhong dashi ji: Yizhangtu kan Xianggang ren nuhou de 231 tian. Baodao zhe. Retrieved October 2, 2019, from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events>.
- 黃育仁 (2019年11月5日)。〈習近平上海見林鄭：「高度信任、充分肯定穩控港局面」〉。華視新聞網。上網日期：2019年11月5日，取自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1911/201911051980065.html>。
- Huang Yuren (2019, November 5). Xi Jinping Shanghai jian Linzheng: “Gaodu xinren, chongfen kending wenkong Gang jumian.” Huashi xinwen wang. Retrieved November 5, 2019, from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1911/201911051980065.html>.
- 程國政 (2008)。《孫子兵法知識地圖》。台北：遠流出版。
- Cheng Guozheng (2008). *Sunzi bingfa zhishi ditu*. Taipei: Yuanliu chuban.
- 傅文成、陳靜君 (2017)。〈募兵政策之媒體議題的媒體信任感與民眾風險感知與媒介使用關聯性研究〉。《復興崗學報》，第110期，頁25–55。
- Fu Wencheng, Chen Jingjun (2017). Mubing zhengce zhi meiti yiti de meiti xinren gan yu minzhong fengxian ganzhi yu meijie shiyong guanlian xing yanjiu. *Fuxing gang xuebao*, 110, 25–55.
- 傅文成 (2018)。〈兩岸服貿協議民眾的媒體信任，政治信任，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分析〉。《中華傳播學刊》，第34期，頁167–206。
- Fu Wencheng (2018). Liangan fumao xieyi minzhong de meiti xinren, zhengzhi xinren, fengxian ganzhi yu xingwei yitu fenxi.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34, 167–206.
- 楊意菁、徐美苓 (2012)。〈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溝通：以全球暖化議題的情境公眾為例〉。《中華傳播學刊》，第22期，頁169–209。
- Yang Yijing, Xu Meiling (2012). Huanjing fengxian de renzhi yu goutong: Yi quanqiu nuanhua yiti de qingjing gongzhong weili.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22, 169–209.
- 楊翔丞 (2018)。《馬、蔡總統時期中共對台政策之比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第61期(2022)

- Yang Xiangcheng (2018). *Ma, Cai zongtong shiqi Zhonggong dui Tai zhengce zhi bijiao*. Zhongxing daxue guoji zhengzh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 劉時君、蘇蘅 (2017)。〈政治抗議事件中媒體的創新使用與實踐：以太陽花運動為例〉。《資訊社會研究》，第33期，頁147-188。
- Liu Shijun, Su Heng (2017). Zhengzhi kangyi shijian zhong meiti de chuangxin shiyong yu shijian: Yi Taiyanghua Yundong weili. *Zixun shehui yanjiu*, 33, 147-188.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ngerter, A., Krings, F., Mouton, A., Gilles, I., Green, E. G., & Clémence, A. (2012).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trust in institutions relative to the 2009 H1N1 pandemic in Switzerland. *PLoS One*, 7(11), e49806.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
- Beck, U. (1996). World risk society as cosmopolitan society? Ecological questions in a framework of 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3(4), 1-32.
- Beck, U. (2008). World at risk: The new task of critical theory.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37(1), 1-21.
- Bodemer, N., & Gaissmaier, W. (2015). Risk perception. In H. Cho, T. Reimer, & K. A. McComa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risk communication* (pp. 10-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ampbell, D. E. (2013).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33-48.
- Campisi, J. M. (2016).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risk in developed econom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4(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polorisk.com/re-considering-political-risk-analysis-in-developed-economies/>.
- Chermak, J. M. (1992).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Past and present. *Resources Policy*, 18(3), 167-178.
- Coleman, C. L. (1993).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societal and personal risk judgmen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4), 611-628.
- Cook, K. S., & Cooper, R. M. (2001).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ooperation, trust, and social exchange. In E. Ostrom &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pp. 209-24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reehan, S. (2012). Assessing the risks of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2(1), 125-128. <https://doi.org/10.1353/sais.2012.0006>

- Dunwoody, S., & Neuwirth, K. (199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 judgments. In L. Wilkins & P. Patterson (Eds.), *Risky business: Communicating issues of science, risk, and public policy* (pp. 11–30). New York: Greenwood.
- Ems, L. (2014). Twitter's place in the tussle: How old power struggles play out on a new st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5), 720–731.
- Finucane, M. L., Alhakami, A., Slovic, P., & Johnson, S. M. (2000). The affect heuristic in judgments of risks and benefi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3(1), 1–17.
- Hansson, S. O. (2004).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risk.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8(1), 10–35.
- Hayes, A. F. (2009).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6(4), 408–420.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uddy, L., Feldman, S., Taber, C., & Lahav, G. (2005). Threat, anxiety, and suppor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593–608.
- Huijts, N. M., Molin, E. J., & Steg, L. (2012).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y acceptance: A review-based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6(1), 525–531.
- Jones, D. A. (2004). Why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med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9(2), 60–75.
- Kennedy Jr, C. R. (1988).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A portfolio planning model. *Business Horizons*, 31(6), 26–33.
- Kim, W., & Sandler, T. (2020).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errorism and conflicts. *Global Policy*, 11(4), 424–438.
- Kobrin, S. J. (1979). Political risk: A review and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0(1), 67–80.
- Lau, R. S., & Cheung, G. W. (2012). Estimating and comparing specific mediation effects in complex latent variable model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5(1), 3–16.
- Lee, F. L. F., Yuen, S., Tang, G., & Cheng, E. (2019). Hong Kong's summer of uprising: From anti-extradition to anti-authoritarian protests. *China Review*, 19(4), 1–35.
- Lichtenberg, J., & MacLean, D. (1991).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Kasperson & P. 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ng risks to the public* (pp. 157–173). Dordrecht: Springer.
- Lin, T. T., & Bautista, J. R. (2016). Predicting intention to take protective measures during haze: The roles of efficacy, threat, media trust, and affective attitud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1(7), 790–799.

- Lin, T. T., Li, L., & Bautista, J. R. (2017). Examining how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relate to Singaporean youths' perceived risk of haze and intentions to take preventive behaviors. *Health Communication, 32*(6), 749–758.
- Loewenstein, G. F., Weber, E. U., Hsee, C. K., & Welch, N. (2001).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2), 267.
- MacKinnon, D. P. (2008).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itchell, J. (2019). Affective representation and affective attitudes. *Synthese, 198*(4), 1–28.
- Neff, R. A., Chan, I. L., & Smith, K. C. (2009). Yesterday's dinner, tomorrow's weather, today's news? US newspaper coverage of food system contrib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2*(7), 1006–1014.
- Paek, H., & Hove, T. (2017). Risk perceptions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Retrieved June 15, 2021, from <https://oxfordre.com/communication/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13.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13-e-283>.
- Peters, E., & Slovic, P. (1996). The role of affect and worldviews as orienting dispositions in the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nuclear pow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16), 1427–1453.
- Prati, G., Pietrantonio, L., & Zani, B. (2012). Influenza vaccination: The persuasiveness of messages among people aged 65 years and older. *Health Communication, 27*(5), 413–420.
- Rhodes, N. (2017). Fear-appeal messages: Message processing and affective attitud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4*(7), 952–975.
- Slovic, P. E. (2000).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Sterling, VA: Earthscan Publications.
- Slovic, P., & Peters, E. (2006). Risk perception and affec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6), 322–325.
- Slovic, P., Peters, E., Finucane, M. L., & MacGregor, D. G. (2005). Affect, risk, and decision making. *Health Psychology, 24*(4S), S35.
- Vijaykumar, S., Jin, Y., & Nowak, G.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virality of risk: The risk amplification through media spread (RAMS) model.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12*(3), 653–677.
- Wahlberg, A. A., & Sjöberg, L. (2000).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media.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3*(1), 31–50.
- Wildavsky, A., & Dake, K. (1990).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Daedalus, 119*(4), 41–60.
- Williams, A. M., & Baláž, V. (2012). Migration, risk, and uncertain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8*(2), 167–180.
- Williamson, O. E. (1993).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1, Part 2), 453–486.

台灣亡國感？

- Yarimoglu, E., Kazancoglu, I., & Bulut, Z. A. (2019). Factors influencing Turkish parents' intentions towards anti-consumption of junk food. *British Food Journal*, 121(1), 35–53.
- Zia, A., & Todd, A. M. (2010).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deology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science: How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cross ideological divid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6), 743–761.

本文引用格式

黃琨戩、傅文成 (2022)。〈台灣亡國感？台灣民眾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媒體信任、風險感知、負面情感與行為意圖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1期，頁161–195。